

后 记

—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是,历史竟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有的相似只是外在形式,有的则是因为同一或类似的本质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陈垢阻挠着社会的前进。从而,当偶然的事件是如此的接近,历史似乎玩笑式地作圆圈游戏的时候,指出必然的规律和前进的路途,依然是一大任务。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全军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戌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

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既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又是必然的。可见,一切个人的素质、性格、教养,事件的偶然、巧合、骤变,尽管可以造成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严重影响,远非无足轻重,但如果与这历史必然的途程比较而言,也就相对次要了。从《资政新篇》和改良派“向西方学习”要求实行近代化以来,一百年过去了。对几代人是如此漫长的苦难历程,在历史却不过是一瞬。然而,为了使曲折的瞬间尽可能缩短一些,则个人或偶然就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必然论之所以不是宿命论,客观历史规律之所以要与主动创造历史相统一,关键也在这里。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 and 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就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学习任务,也应该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首要课题。偶然与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样。

偶然不仅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它的“补充”,也就是说,并非每一偶然都一定是必然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重视伊壁鸠鲁那个不遵循必然规律的原子偏离运动一样,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也应注意各种不同性质的偶然,它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对必然的影响和关系,这样历史才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创造的历史,而不是些呆板的公式和枯燥的规律,也才不是宿命论或自由意志论。但是,思想史和政治史毕竟有所不同,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

出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政治史应该更多在史实的详尽活泼栩栩如生的剪裁记述中,来看出历史发展的生命和趋向;那么,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非必然性的许多东西,从人物的生平活动,直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本身无关宏旨的某些细节的探讨考证,等等,都可以摒除在描写论述之外。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中,则完全不是这样,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本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黑格尔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或人物可以在政治事件中有时起决定性作用,思想史则不发生这种情况。政治史中充满了繁复多变的偶然和机遇,思想史却不然,它只指示着必然的行程。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所讲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因为有时甚至整个时代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这就是思想史的偶然性。思想家哲学家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他独到而深刻地反映了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由此可见,思潮和代表人物这两者应该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本论文集试图朝这方面努力,想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思潮(太平天国、改良派、和革命派)和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许多次要人物、反动人物以及这些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与主题无关的或次要的思想(如某些学术观点、佛学素养等等),大都略而未谈。全书各篇也大都是概括性的而非专题性或传记性的研究,它的目的不在对这些人或某个问题作详尽无遗的记述,而只希望通过这些思潮和人物的概括论述,对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必然规律和趋向有点用处。

二

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世界范围内,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由西而东,如果说,这独具特色的一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是那抽象而深刻的古典哲学;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那么,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了。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了。因此,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如前所说,思想与人民、国家、民族的主要课题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缺点则是由于政治掩盖、渗透、压倒和替代了一切,各个领域或学科的独立性格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展

开和发挥,深入的理论思辨(例如哲学)和生动的个性形式(例如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发展,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哲学作品和艺术作品。

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作为绝对精神的历史,应该表现出时代的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倒符合这一要求。从表面上看,中国近代思想似乎五光十色庞杂混乱。事实也确乎如此。中国近代处在古今中外大聚汇大变革的交错点上,各种新旧事物极为错综复杂地折射在人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和事物差距和变化是如此的大,当一些人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的时候,另一些人还死死抱住“诗云子曰”“圣经贤传”,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些人今天还沉浸在封建故纸堆中,明天却已跃进到最激进的革命行列。新旧因素、势力和意识形态是这样交错杂陈,急剧震荡,表现为种种庞杂混乱五光十色,也就并不奇怪了。但是,在这庞杂混乱之中,并非毫无规则可寻;恰好相反,中国近代思想有其历史和逻辑的规律,是曲折地向前开辟着自己的道路的。它的矛盾发展的辩证过程,提供了整个时代活动的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中心课题,中国近代思想的激剧波动,是与先进思想和反动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分不开的。在斗争中,思想通过辩证的否定来提高和发展,终于到达了今天这样的新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真正输入中国以前,中国基本上出现和经历了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它们处在不同历史时期,属于三个不同类型,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这三种社会时代思潮,就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改良派自由主义的变法维新思想和革命派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三种思潮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主流。它们在近代中国陆续出现和相互交

替,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现象。

革命的农民风暴是在中国近代首先登场展开的巨大演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是中国首先出现的近代先进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特点就是要求摧毁旧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暴力狂涛。它以叱咤风云的“冲天”精神对各种旧制度——从政权到风习,从经济到文化——执行了武器的批判,提出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求。从而,它与地主正统思想形成了对垒。这一思想的出现客观上本应为古代封建社会的结束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作一次革命冲洗,在当时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推动或影响下,平均土地的《天朝田亩制度》之后,绝非偶然地出现了主张兴建近代企业的《资政新篇》。所以,这一思潮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农民革命思想的总结,包含了指向资本主义新因素的进程;另一方面,它的幼稚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宗教迷信主义等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也充分表露了出来,显示出这些东西在近代中国社会确有其深厚的现实土壤和传统。它说明,就是在反地主统治的革命中,小农的封建性及其沉重的社会影响也不可低估。

太平天国失败了,历史的进程曲折地通过社会上层来实现。紧接着农民革命思潮的近代序幕后面的,真正的历史主角的资产阶级思想抛头露面了。它首先表现为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这一思想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迥然不同于太平天国,这一思潮先进特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中国独立富强,在近代最先明确提出了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走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现近代性质。这种思想与当时封建主义正统思想进行了论战,在社会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像康有为这样的人物是开时代之先声的。

戊戌变法失败,代替它兴起了要求推翻清朝政府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如果说,改良派自由主义是对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第一个否定;那末,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却并不能算作第二个否定。革命民主主义吸取了前面两个思潮的合理内容,在经济上,太平天国提出了平均土地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未明确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改良派提出了这一要求又反对土地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来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太平天国主张彻底打垮清朝异族专制政府,但又建立新的君主专制;改良派反对推翻清朝政权,却主张用立宪君主代替君主专制;革命派反对改良派,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革命民主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时期整个思想的末端,本应是上两阶段的综合和总结,是否定之否定,但实际上却并没能如此。革命派既没有发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暴力革命,也没能在经济、政治上实现资本主义进步改革。打倒了一个清朝皇帝,带来的反而是新形式或旧形式的大大小的洋皇帝或土皇帝,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痛苦凄惨的未完成交响乐。无论改良派、革命派都只是对太平天国螺旋形地上升的一环,都只是第一个否定,封建主义结合现代新形式,反革命的镇压反而变本加厉,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全过程并没有完成。所以,第二个否定的出现和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圆圈的完成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新民主主义由于回到农民战争(当然在“高一级”的新形态下)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政权的取代却不等于封建主义的自动全面消失,相反,从体制到观念,留下了农民革命的深重印痕,从而,由改良派提出的人权、民主等历史要求反而也以高一级的新形态更突出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了。扫除一切封建残存,实现祖国富强和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神

圣任务。如本书好些论文所说明,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无论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或邹容呐喊的平等博爱,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此外,从洪秀全到章太炎的种种小生产者的空想和民粹主义,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享有广泛市场和长久影响。康有为基于大工业生产的《大同书》雄大理想倒如同他这本收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书一样,淡漠地消失在数千年农业小生产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规律对近代中国作了无情的讽刺。农民革命的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封建剥削和统治;章太炎的半宗法半牧歌式的主张可变而为梁漱溟“以乡村为本位”之类的民粹主义实践,并为毛泽东所注意^①。经济基础不改变,自由民主将成为空谈;而要改变小生产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又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方面,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不断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

如前所指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在纯粹理论部门(哲学或社会、政治、文化的理论学说上)内是缺乏深度的,没能提出一个比较系统、深刻、完整的哲学体系。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内部蕴藏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具有丰富的辩证

^① 毛之亲近甚至破格垂青于梁,实因二人有关於农民的共同语言,后毛之批梁,亦因感梁有代表农民向其挑战之可能,绝非一时性发的喜怒无常。

法的因素和贯彻着一种讲求实际、主张科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包含着十分浓厚的夸张主观心知和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其中由经验论走向主观唯心论和主观地运用辩证法,是最值得注意的哲学迷途。与此同时,缺乏与近代科学的内在必然联系,低估、轻视理论思辨,带来了日后实用主义大举入侵和主观主义与权力意志恶性泛滥的严重后果。

三

从洪秀全到鲁迅,本书论述的是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近代正统派的思想。它们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其现实根源是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其思想渊源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中国封建儒家思想。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它或者以封建生产方式这样一个共同体作为基础,从而渗进农民阶级的思想观念中,使农民革命创造出一个异化的实体,从精神和物质上统治、奴役压迫和剥削自己,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反而创造出无所顾惜和无所不为的特权集团和阶级。它或者随着近代气候而转换衣裳,穿一件“中体西用”的新装来抵挡资本主义;它最终则以素有传统极为发达的中国帝王的统治权术,来破坏不可阻挡的近代民主潮流。虽然心劳力拙,每况愈下,但近代中国这种种封建主义的妖魔鬼怪却并不可轻估,详尽研究它的来龙去脉,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本书未能进行这项研究。这里只以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三个典型,作为上述三大进步思潮的主要对立面,来概略窥视一下这个统治意识形态某些重要特征。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有赫赫声名的的大人物,是众满清政府到蒋介石、毛泽东所优礼崇奉或大加赞佩的主要偶像之一。他的各种“全集”、“文集”、“日记”、“家书”充斥市场、乡里,被一再翻印出版。从军事、政治到诗文,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完人”。尽管太平天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当年对他都有过冲击,但他的那一套仍然顽强保持下来,甚至以前攻讦过他的人,后来又拜伏在他的思想或“人格”面前(包括像章太炎这样的革命派健将和今天的许多人)。

那么,他的特点在哪里呢?曾沾满太平军战士的鲜血,他公开主张杀人^①，“一概剜目凌迟”“一律斩薙无遗”便是他的功业。另一方面他又用庄重肃穆而又温情脉脉的封建道德的面纱把这一切掩盖起来,所谓“刚柔兼备”“阳儒阴法”,并把它贯彻到日常生活和个人修养各种具体的细节中去。所以曾国藩不仅在军事危急关头提出保卫孔孟伦常的战略性口号,把保卫满清政权与保卫千百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核心就是三纲五常作为主干的封建政制)自觉地统一了起来,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把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封建道德建立在维护封建性的小农生产和宗族团结的基地上,强调所谓“耕读为本”^②，“早、扫、考、宝,书、蔬、鱼、猪”^③,都是要家中子弟一面读书,一面要参加一些

① 曾自称“用重法以除强暴,而残忍严酷之名在所不辞”“二三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曾文正公书札》)。

② “以耕读二者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曾文正公家书》同治6年5月初5日)，“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者,败家之道也”(同上,咸丰4年9月13日)，“即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作媳〕……,总以无富贵气习者为主”(同上,道光29年4月16日)。

③ “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宗祀……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同上,咸丰10年闰3月29日)后四项自明,即种蔬菜养猪喂鱼等等。

劳动,一定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封建性的小农生产,并且再三再四叮嘱,规定得相当具体细致^①。似乎有点奇怪,高官厚禄者居然对自己的子弟如此强调“勤俭”和劳动,这不是十足的虚伪和欺骗么?然而这并不是装出点样子来骗骗人的外在虚伪,而是一种忠诚的虚伪,因为曾国藩之流的确相信这一套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能够保持家业不败,也好出仕做官。不只是简单地剥削农民镇压革命,也不只是简单地重复那些空谈性理的高头讲章,而是要求官僚子弟也必须身体力行这种所谓“耕读”、“勤俭”,以“正人心”“敦风俗”作为齐家治国的“本”,即要求巩固封建小生产的方式,积极参与和经营管理这种经济,以维持这种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切关系、风俗、道德、观念、氛围……,在这基础上,来保卫封建伦常政制^②。曾国藩位极人臣,仍念念不忘所谓“耕读为本”,这才是他的特色所在。

曾的这一套影响颇大,他的《家书》《日记》所以比其诗文奏折还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被看作颇有道理值得学习,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严重存在。

其实,从颜之推的《家训》起,就有各种封建地主阶级的“治家格言”,到曾国藩这里,算是达到了高峰。然而,不同的是,颜之推处在封建经济的上升时期,他的家训还有其组织管理生产的历史

① 例如:“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不因其富贵子弟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同上,咸丰6年10月初2日)，“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同上,咸丰4年8月11日)，“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同上,咸丰8年11月23日),等等,《家书》中触目皆是。

② 甚至连说话、走路也要求子弟不能太急太露太匆忙,宁肯迟钝一些,因为迟钝才会“稳重”,《家书》中一再问他的儿子“尔走路近略重否,说话略钝否?”“说话迟钝,行路厚重否?”

进步意义；曾国藩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已敲醒中国的大门的时代，这一套便只具有陈腐不堪了^①。尽管是提倡劳动，也掩盖不了它保持封建剥削和传统统治的残酷实质。其虚伪的深刻意义也就在这里。

中国近代正统思想是继承这一衣钵的，只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逐步侵入，随着改良运动的兴起，采取了新的形态，其中有所谓顽固派与洋务派之分。

顽固派的特色是愚昧地顽固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也许除了日用洋货和鸦片烟之外，自然科学、工艺技术、铁路、轮船等等，都在排斥反对之列，更不用说思想、学说之类了。理由是所有这些都不合中国的封建圣道，中国是“天朝上国”，自有纯正的“圣人之道”来治理^②，这就是“正人心、敦风俗”、“有治人无治法”，“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总之是搞清官，搞道德说教，维护小农生产，反对“邪说异端”“离经叛道”^③。洋务派在本质上与顽固派一

① 如果拿同样有名的袁枚的书信与曾国藩相比校，便可清晰地看出二者的不同，一个具有浪漫生气，憧憬个性解放，嘲笑陈规旧习，要求离经叛道；一个却如此迂腐不堪。然而袁枚比曾竟早了一百年！

② “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者则益憾，独于洋烟，甘心吸嗜……”（郭嵩焘《复姚彦嘉》）“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今之士大夫犹多鄙夷事务，有以西学用心者则讥之曰悖圣教，有以西法相尚者则斥之同攻异端”（杨毓麟《盛世危言·序》），“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王韬《变法》），“疑为异学而摈之，嚚嚚然自命为圣人之徒……”（陈炽《庸书·格致》）。

③ 如“奏为自强全在得人，法制未可轻变……舍富强无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法更无富强之术等语，此离经叛道之谈，人心风俗所关不可不辩。夫中国之所以维持于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即令富强埒于泰西，而人心之陷溺之不救，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治乱之机，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由末及本可也，尊夷非圣不可也”（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奏陈管见折》光绪 21 年）。

样,不同的只是他们主张采用西方的工艺技术以至科学(“用”)来保卫和巩固封建主义的上述“圣道”(“体”)。这些人可以主张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必须是官督商办,由封建官僚来控制监督;这些人也可以同意读西书,办报纸,但必须是不致引起对封建“圣道”和圣经贤传的任何怀疑;他们也可以提出著名的“江楚会奏”的变法三折(张之洞、刘坤一),但绝不能实行民主或民权。封建主义的统治体系及其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变动的,在这前提下才可以采用西方工艺科技以及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就是这种封建主义在近代条件下的变形。它被当时很多人视为真理,满足了那些既要顽固保持传统封建文化和统治体系,又得适应环境搞点富强的人的胃口,欺骗性很大。甚至过了几十年,包括像陈寅恪这样有高度西方文化教养的学者也仍然自称其政治思想是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这就说明,决不可以低估这种理论的严重影响了。关于顽固派和洋务派、关于张之洞,本书有关论文已有所评议,这里就不多谈了。

如果说,曾国藩的“耕读为本”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具有某种思想理论意义的话,那么,随着封建统治的分崩离析,到袁世凯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思想理论可言,而纯粹是以个人野心和阴谋权术来维护这种统治了。无论是权术阴谋或袁世凯本人,都无资格进入思想史的篇章。然而却正是这种封建糟粕,在一定短暂时期内,居然可以玩革命于掌上,骗人民于鼓中,严重阻挠了历史的前进。袁世凯本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阴谋权术家而为以后各种军阀统治者所效法不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史又应该重视和著录它。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描写 1848 年革命到 1850 年拿破仑第三称帝这一时期,野心家阴谋家拿破仑第三如何利用形势,

先后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各个派系势力打下去,小丑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深刻标明这是革命的不断败北。如果拿辛亥革命到洪宪称帝这段历史与之对照,真是何等相似!袁世凯一步一步地收拾了国民党、进步党、原革命派、原立宪派等各种派系势力,又收拾了议院、国会本身,用暗杀(如宋教仁)、收买(如议员)、软禁(如章太炎)、笼络(太多了),或凭空制造舆论(从民初的“非袁莫属”到“筹安会”“乞丐请愿团”……),或公开武力威吓(如用军队包围国会强迫投票),……总之,用尽一切阴谋权术,以达到唯一目的:作大权独揽、人莫予毒、不受法律约束、不受任何钳制的实质上 and 名义上的专制皇帝。

这种独裁权力当然首先靠军队,袁以练兵起家。然而,他搞独裁专制,却总是盗用全国人民利益为名义^①,并且总是以极端谦逊的虚伪姿态出现。袁一面极力制造称帝活动,一面却极力否认称帝,再三公开驳斥、反对,口口声声是“退休乡里”、“翩然挂冠”、“长为老农以没世”,甚至连他数十年的老朋友和最亲密的老同僚也欺骗。(所以终于众叛亲离,连老部下段祺瑞、冯国璋,老同僚如徐世昌也抵制这位皇上。)

“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除了这种标准的两面手段之外,其他的权术阴谋也仍是中国封建帝王的老一套,从《韩非子》到《资治通鉴》中所在多有:无非是平衡术,互相监视术,喜怒不测、朝令夕更术,等等。总之使部下捉摸不透,畏惧万分,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虽然袁并未能完全做到这一

① 如“查中国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之能治与不能治,率系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使为国之元首而有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备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本大总统一人一身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好家伙,他袁世凯受约法束缚,就等于四万万中国人受束缚!

点)。这一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袁世凯居然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用无数流血牺牲所召唤得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议院制度和共和政体,通过这套阴谋权术的纵横捭阖,不几年便完全化为乌有,即使在形式上也不保留。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什么“民意——是四万万人民请他当皇帝——的“法定形式”来实现的。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拿破仑第三当上皇帝是由于农村的原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诚如列宁所说,是“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第4页)的,这也正是政治上层尽管丑剧频仍,人民群众却并不关心也无法关心的原故。如果袁世凯不硬要设法让儿子作继承人以至损害了他的大将们(段、冯)的利益,即不硬要当名义上的皇帝,那么他在实质上的皇帝(没有国会制约的终身总统)也许还可能维持更长一些时候。但是,当上皇帝的拿破仑第三搞了二十年,法兰西终于在经济上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袁世凯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把中国拖进军阀混战的泥塘。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只能产生这种凶残伪善的封建末代皇帝。袁世凯把资产阶级民主扼杀在摇篮之中,继承曾国藩张之洞的传统,复辟“耕读为本”“中体西用”之类的封建政制,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后来的独裁统治者又几乎走着同样的道路。

专制独裁统治亿万人民,人民不过是工具、牲畜、一任随意摆弄。有人总结说:

亿万人是只准供他(指袁)试验,四年之间,他试验的东西又真多了,一会儿内战,一会儿五国大借款,一会儿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一会儿解散国会,一会儿大捕大杀反对者,一会儿临时约法,一会儿终身总统,一会儿签订二十一条,一会儿国民代表大会,一会儿大皇帝……,这一切试验,都是

叫做拯救生灵,保卫祖国。

这说得不错。然而,历史的辛辣讽刺却是,写这些漂亮的批判语句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成为林彪王朝的无勋策士的陈伯达。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竟至如此地捉弄人,野心、阴谋和权术居然又附在“新”一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出现了。刚刚批过“窃国大盗”的人,自己又想做窃国大盗了。“称天才”、“设国家主席”、“当女皇”、“按既定方针办”,不断上演的竟仍是这样一幕幕令人作呕的封建丑剧,一百年前的先进中国人已经在要求开议院重民权,一百年后的今天,封建主义的阴魂却仍然如此不散,并且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似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正是值得深思和总结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严重教训么?

四

最后把本书写作情况简略说明一下。

十篇文章实际写于两个不同时期,三篇《研究》(一九五八年以《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略有增改)和孙中山文写成、发表于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之前,其他各篇写成和发表于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回忆五十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捐献声中写成谭嗣同研究第一稿时,还在北京大学上一年级,对一切满怀天真幻想;而在七十年代末不无感慨地草写太平天国时,历史已过去快三十年了。尽管二者合成此书时作了一些统一修改,但毕竟各自带有时代的不同印痕。写于五十年代的大体分析稍细而略繁琐,写于七十年代的则又失之过粗,基本是些提纲性的东西。但整个文字、风格倒可能一致,即相当枯燥无味。其中,时代所给予的各种印痕,从论点、论证到文字,毕竟无可消除。如

书中(也包括其他拙著)屡用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一词,即三十年代流行的 feudalism 之中译,指的是上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 and 传统体制,此译、此词毫不准确(中国早即“废封建,立郡县”),但既已约定俗成,便一时难以更换,只愿不以辞害意,请读者留意及之。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因之,如何在深刻理解多年来沉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重新看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总结出它的科学规律,指出思想发展的客观趋向以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在今天,比任何时候,将更是大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七八年秋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